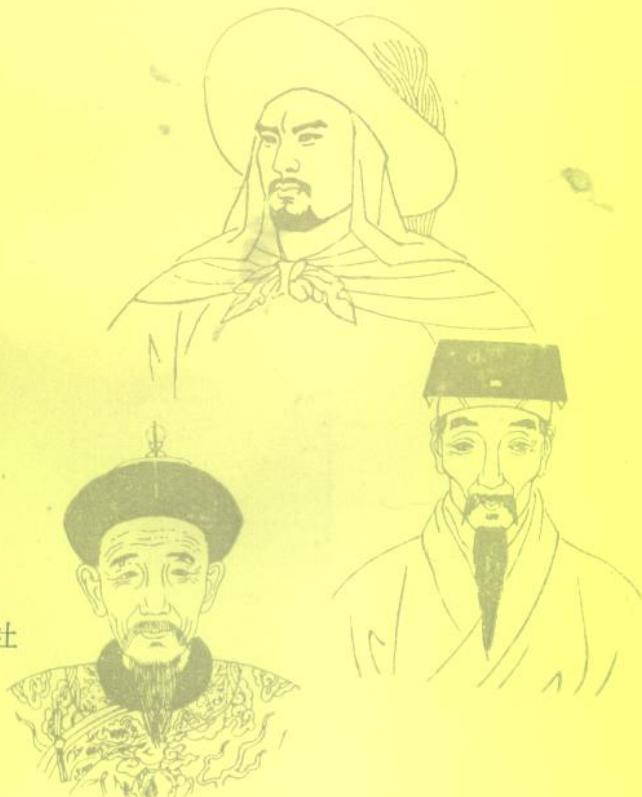




明清人物 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22.25
135
1



上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0808

责任编辑：吴长显
封面设计：宁成春
扉页设计：盛寄萍

明清人物论集（上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资中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 插页5 字数308千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400册

书号：11118·85 定价：1.42元

编 辑 说 明

本丛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为总结建国三十年来历史研究上的主要成果、整理史学领域内的重大争论、推动学术进展和促进文化繁荣而编辑。丛书按专题分册，选录各该专题的代表性论文，附以论著目录索引，并做出综合述评或简单说明。述评力求公正客观，目录力求全面系统，选文力求反映出研究面貌和水平。

本丛书由国内主要出版社分别出版，适合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者及高等学校文科师生阅读。

本集说明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循着一定规律前进的，社会的每一变化都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但是，承认这种规律性，并不是说就可以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的：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六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个人的活动都要受到一定社会条件的限制，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这里指的是社会活动）又是该时代一定社会关系的表现，或者可以说，每一个历史人物又都是反映当时社会某个侧面的一面镜子。所以，对一个时期各类历史人物的研究，无疑是对这段时期历史进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濒于崩溃边缘的封建制度的躯壳之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势力已经带着自己朦胧的要求出现于历史舞台。人民大众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的阶级基础日形扩大。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这种制度的不崩溃而更加强了专制统治。这时世界已在向资本主义迈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渐次传入中国，西方殖民主义者也由觊觎而开始派遣海盗把侵略魔爪伸向古老的中国。中国人民反封建专制统治和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处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中的各种历史人物，无不在思想和行为上带着浓重的时代特色。通过对这些人

物的研究，就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明清时期历史的认识和了解。

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加强，发表了大量的专门论著及文章。其中单只专门研究这段历史时期（公元1368～1840）人物的文章就达一千余篇，涉及近一百五十个历史人物。为了给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方便，我们编选了这个《明清人物论集》，共选入文章三十四篇，论及二十六个历史人物。我们给自己定下的编选原则是以学术性为主。凡对这段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方面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文章，选其有代表性的一篇或两篇；存在观点分歧的人物，力争各种不同观点均有代表性的文章入选；注意到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一些比较特殊的历史人物，由于涉及的面较广，研究文章很多，非一两篇文章所能勾画出其完整轮廓的，如思想家、文学家及他们的著作等，则暂时从略，留待将来编专门的集子。为了便于检阅，我们编了一个有关文章简目作为附录。由于编者水平及所见有限，缺点和错误肯定很多，恳乞读者予以指示。

田培栋 谷葛计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从元末农民起义与明初社会状况论

- 朱元璋的历史地位 柯建中 郭厚安 (1)
论朱元璋的蜕变 陈梧桐 (41)
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 容肇祖 (59)

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 韩振华 (96)

- 论海瑞 吴 哈 (127)
清官海瑞 刘重日 曹贵林 (151)
论张居正变法 唐贊功 (183)
论明代张居正在改善蒙汉关系中的贡献 赵 循 (198)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赖家度 李光璧 (220)

明代御倭战争中的戚继光和戚家军 李光璧 (234)

谈明末袁崇焕坚守宁锦的敢战敢胜精神 商鸿逵 (255)

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胜利斗争		
——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	丁名楠	(268)
史可法的评价问题..... 李廷先 (283)		
论史可法.....	秦子卿	(301)
李贽的进步思想..... 侯外庐 邱汉生 (325)		
晚明杰出的一位科学工作组织者、宣传者兼 实践者——徐光启..... 袁翰青 (367)		
论宋应星的思想..... 何兆武 (383)		
谈迁和《国榷》.....	吴 咨	(407)
附 录		
建国以来有关论文简要目录.....		(427)

从元末农民起义与明初社会状况 论朱元璋的历史地位

柯建中 郭厚安

—

朱元璋（1328～1398）出身于贫苦佃农家庭，曾在“家道惶惶”的境况下“托身缁流”，作过游方僧。在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开始以后，破产的农民蜂起响应，朱元璋在“四境逼迫”的情况下，也卷入了这一斗争的行列，投身于郭子兴军中作了一名亲兵。这是朱元璋一生中重大转折点之一。在此之后，他逐渐蓄积力量，扩大地区，统一中国，建立起为时约三百年的大明王朝——一个家长式专制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是和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及明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决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决不否认历史是由人们创造的。历史学家在探讨元末明初之际时，是应该给朱元璋一定的公正评价，而不能忽视和抹煞的。

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创造人类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人类历史又是异常复杂的。如果我们只加以简单的理论剪裁，则势必忽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的作用，势必把元末明初之际的历史纯然归结为“杰出人物”朱元璋的聪明才干。显然，

这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唯心主义观点。

例如：有的同志过分强调朱元璋的出身和他年轻时的遭遇，孕育了他的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感情和民族意识，并且认定他是天资聪颖，敏慧过人，谦虚刻苦，有善于团结群众的优良作风，有高度的军事艺术天才，在反元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依靠农民士兵群众。因此，他是一个“天才的、杰出的领袖”。至于朱元璋在明初的各项政治措施，也都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因而，总的结论是：“他的事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应该指出，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繁复的历史事件的进程，简单化为朱元璋的个人特点和阶级出身，而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①这就告诉我们，判定一个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必须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我们的意图，正是想透过元末农民起义和明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对朱元璋进行全面的估价。但我们不一定能把这件工作做好，失误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七～四七八页。

二

要评价朱元璋，当然首先得从元末农民起义谈起。

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之勃兴及其灭亡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事情。就中国来说，它也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统一封建国家。由于蒙古族本身所处的社会阶段的低下，它对中国的统治就带有浓厚的落后性和野蛮性。

在蒙古铁骑侵入中国本土的过程中，《元史》蒙古诸将列传几乎篇篇都有“杀戮殆尽”，“骸骨遍野”的记载。徐大焯《烬余录》乙编记兀术陷苏州时：

小儿子十岁以下，男子四十以上及四十以下不任肩负与识字者，妇女三十以上及三十以下向未裹足与已生产者，尽戮无遗。尤奇者，凡有书籍之民居，有簿记之店肆，必尽火其屋，尽杀其人。

这种惨无人道的作法，真是历古未有，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就这样受到严重的破坏与摧残。

在元朝统治下，大批人口被屠杀或被掳掠为奴隶，大量田土落在贵族王公僧侣豪商手中，并且还有很大一部分被荒废为不耕不稼之牧场。

广大的北方地区，纯然要靠“海运”为生。据邱浚《大学衍义补》说：海运“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客观事实也正是如此，故记载称其“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①，并且“岁以海漕之迟疾丰俭顺阻为忧喜休戚之

^① 《元史·食货志》。

分”^①。元末张士诚、方国珍据浙江，海运阻隔，元朝京师顿然出现严重饥荒^②，这一事实肯定表明当时北方农业经济的凋破，以致不得不如此严重的依赖着江南漕运。

再看看鱼米之乡的江南。至正时这一地区已经是“频岁不登，……荒芜滋甚”^③，而被人称为“贫极江南”了。首先，元朝政府在江南拥有大量公田，而江南豪家也广占农地，驱役佃户。问题还不仅此，这些富强豪民，隐藏田租^④，破坏水利^⑤，骚扰乡里^⑥，再加上水旱灾荒，于是出现了“昔者膏土，今为陂湖”^⑦的情况。

广大的劳动农民，在农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生活境况的悲苦，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仅要受官私地主的剥削，而且要负担各种繁苛的徭役。当时畸形发展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也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两重大山。

元代商业的发展是畸形的，在政府大量发行纸币的政策下，“物重币轻，而官民困矣”。同时，“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⑧。大批手工业者又沦为工奴。这些事实说明了一般的工商业者在元朝统治下的遭际仍然是不幸的。

① 《海道经附录·供祀记》。

② 权衡：《庚辰外史》；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

③ 《大元官制杂记·行大司农司条》。

④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一，《童贤母传》。

⑤ 《大元官制杂记·都水庸田伎司条》。

⑥ 邵亨贞：《野处集》卷三，《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兼劝农事汪公行状》。

⑦ 朱德润：《存复斋续集·平江路向弭盗策》。

⑧ 均引自《存复斋续集·送张德平序》及《平江路向弭盗策》。

再看元朝的政治情况。一切军政机要大都操于蒙古人之手，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参与政治管理，民族歧视的鸿沟，堵塞了他们“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出路，使他们处于抑郁愤懑的状况中，并和元朝政权取敌对的态度。

此外，蒙古贵族与元朝官吏骄奢淫逸，贪污腐化，残虐百姓，胡作非为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而在制度与法令方面，既是“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以并缘为欺”，再加上“衙门纷杂，事不归一，十羊九牧，莫所适从”^①，因此，其弊陋与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部分参加政权管理的汉人，一方面形格势禁，感慨元朝的地方行政官吏不好做^②，另方面，“充位而具员，彼食焉而怠其事者皆是也”^③。有些知识分子已经看出这种情况对元政权的不利，所以他们写道：“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内，而肝胆实有吴越之间”^④。在王惲《王忠文公集》卷三《送吏部员外郎月君序》一文中，就对于元末农民起义前夕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一概略的描述，兹将其文摘引如下：

国家数年以来亦可谓多事矣。十一年，充、济之间塞决河，十三年，京畿之内开营田，二者皆大役，其费累巨万，……自十二年以来频岁用兵，天下骚动……凡转输供亿，县官不足，则尽征诸民，而所在之民，大札大祲之余，存者无几，创痍未瘳，悉剗剔脂髓以应上之科敛。又楮币者，天下

① 《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

② 李继本：《一山文集》卷四，《送内史金院董公景宁赴河间总管序》。

③ 杨翮：《佩玉斋类稿》卷六，《送袁仲序》。

④ 《草木子》卷四下。

之大命也，而乃沮不克行。……朝廷之上，纪纲法度，且日纷更而未已，国家之多事，莫此时为然矣。

这就是当时目击者的记录，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政治败坏，经济残破，民不聊生的元末社会图卷。它是蒙古统治者给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勤劳勇敢和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劳动人民，一直在和这种灾难进行顽强的搏斗。从忽必烈至元十六年灭南宋之日起，反民族压迫的武装力量，在整个元世祖时代，就已席卷了江南的广大地区。自此以后，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更是起起伏伏，绵延不断。到妥欢帖木儿元统至正之间，年年发生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也进一步推动了人民的反抗情绪。“山雨欲来风满楼”，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的条件就酝酿成熟了。飘摇欲坠的元朝政府在这股巨大的洪流面前，是经不起冲刷的。

至正十一年（1351），在韩山童、刘福通的号召下，声势磅礴的农民反元武装斗争就在淮水流域一带爆发了，并迅速的扩展到汉水流域，最后囊括了整个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这里不准备对起义军的斗争过程作详尽叙述，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这次震动大半个中国的历史事件来探索朱元璋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考察一下元末农民起义带有些什么特点。

如同许多专书与论文所指出的，这次起义是用白莲教的宗教形式组织的，它具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它的基本力量是贫苦农民。由于元朝政权打击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也就决定了起义军成份的复杂性，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者、商人、渔民、盐丁、个别的地主阶级分子以及从这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

子。仅凭这一点也够说明，当时反元情绪是多么强烈和广泛！

除此而外，我们还要着重探讨两点：

第一、这次起义有着惊人的发展速度，并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

可以清楚地看出，从韩山童、刘福通首事以后的几个月期间，各地义军风起云涌。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参加了起义队伍。当时的文献记述，“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日间，从者殆数万”，“红巾帕首者动数十万，所在蜂起”，“于是四境之内胥而为‘盗’者十六七”。^①就是那曾经恶毒咒骂过红巾军的文人李士瞻在给元朝统治者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不数年间，使中原云扰，海内鼎沸，山东河北，莽为丘墟，千里王畿，举皆骚动”^②，这就不能不看出农民队伍声势的浩大了。而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也不能不对朱元璋发生作用。

决定农民军迅速发展的因素，首先是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正确的提出了“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政治口号。其次，起义军军纪严密^③，和元军烧杀抢劫的情况成一鲜明对比，也赢得了更多的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壮大了起义队伍。

人民群众对义军的支持，大大加速了元朝政权的土崩瓦解。

① 《草木子》卷三上，顾瑛：《玉山璞稿·饶歌十章并小序送董参政》，苏伯衡：《苏平仲集》卷十二，《故元中奉大夫周公墓志铭》。

② 李士瞻：《经济文集》卷一，《上中书丞相书》。

③ 正规的红巾军的史实，由于明初的忌讳和窜改，有的淹没了，有的歪曲了，但在部分记载中仍流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如《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条及《平胡录》，均称其“不杀不淫”。永乐时人李昌祺所著之小说《剪灯余话》卷二《鸾鸾传》也称毛贵军“颇知道理，凡所掠男女，出榜召人认识给还”。足见红巾军纪律严明。

尽管它也调派了大量军队来镇压起义队伍，尽管它还拥有庞大的地方政权和武装，但这些都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并常常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使元朝将官被迫投附起义军。例如至正十九年胡深降朱元璋，王禕《王忠文公集》卷十八，《故参军缙云郡伯胡公行述》记载此事时写道：

（胡深）时以假元帅统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四路兵，欲闭关为拒守计。四县士民，咸请于公，愿内附以全民命。……公知时事已去（乃降）。

在王禕的集子里，还不断地感慨元朝地方官吏的“变节投降”，说什么“服节死义者……未尝多见”，而“大都小邑，弃君叛父而卖降者，何其众也”^①。他不了解，在大批地方官投降起义军的背后，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那就是农民喜欢起义军，不拥护元政权，如果他们还要死心的为元朝政权效劳，就只有被群众革命的浪潮所淹没。

第二、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起义军行列，而起义军首领也主动欢迎他们，这是元末农民起义的显著特点之一。

上面已经提及，元政权的民族鸿沟，堵塞了汉族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虽然部份大地主参与了元朝最高的行政机构，虽然当时的阶级压迫依旧存在，但是，汉族地主与蒙古贵族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民族矛盾的一个组成部分。地主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有民族气节的分子，对元政权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这种心情，在他们的诗文中不断地流露出来。

^① 《王祎集》卷十二《福宁王尹赞》，卷十四《书闽死事》，卷十七《刘杰孙传》。

如果把他们划分一下，则约可分为三派：一是投降派，二是中间派，三是反元派。

投降派是没有民族气节的大地主，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曾受元朝政府招抚，在元朝政府作过大官，奴颜婢膝，求得一点好处。①当元政权崩溃时，他们一方面上条陈，出主意②，另方面则组织武装，顽固地帮助元朝镇压人民③。亲元文人张光弼的诗集中称道他们是：“一死得埋元氏土，寸心无愧首阳薇”。然而，他们与蒙古统治者是一丘之貉，同是革命的对象，受到了决不留情的打击。李继本《一山文集》卷一《送李顺文》中说：“‘妖盜’起潢池，跳梁袞林隙……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中间派动摇于二者之间，既不满意元朝政府，又害怕农民起义。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前不愿与元政权合作，现在又避开农民革命的锋芒，过着自命清高的生活，但当革命力量强大时，其中一部分仍然充当了屠杀起义军的刽子手④。

最活跃的是反元派。这一派在元朝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他们一直是反抗民族压迫的力量，但这个力量是消极的，有着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早在元初，如史学家马端临、胡三省，哲学家金

① 《逊志斋集》卷二二〈俞先生墓表〉称：“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租戾，变礼文之俗……为士者辨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附于上，冀速获仕进”。或者巴结僧侶贵族，与其“称尔汝之交，居恒簪绂羽衣相错，无惭色也”。

（李日华：《恬致堂诗话》卷四）当农民战争爆发后，这些亲元派便纷纷投靠元朝军队，企图共同镇压农民起义。

② 早如北士吴助教陈定本十六策（见刘埙：《隐居通义》卷三一）。又如至正时李士瞻言时政二十条（《元史》卷四六《顺帝纪》）。

③ 元末地主武装，在宋濂、苏伯衡等人文集中记述颇多，不一一列出。

④ 宋濂：《翰苑别集》卷七《清风亭记》所载之地主武装首领邓彦诚便是一例。